

地域文化与乡土叙事对象选择

——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

韩鲁华, 郑 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不同的地域造就不同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等,这必然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本文以长期关注的几位作家为例,对其创作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文学艺术都植根于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地域文化不仅是乡土文学叙事的根基和文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也是作者先天文化基因与文化认同感的自然流露。

关键词:地域文化;乡土叙事;创作对象

中图分类号: I 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4-0058-07

Regional Culture and Local Narrative Object Selection

——Lu Yao, Chen Zhongshi, Jia Pingwa as examples

HAN Lu-hua, ZHEN Hua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humanistic background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vary regionally, which inevitably affect the style of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exts created by the preoccupied writer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and art are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loc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narrative characters live, but also the author's innate cultural gene and the natural express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local narrative; object creation

在对当代文学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从他的故土生活的叙事开始的。更有甚者,有些作家,一生都在叙写自己的故乡生活。或者说,他一生的文学创作,都受到自己故乡生活的

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一、地域文化与文学叙事

文学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与地域文化那更

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可以说,文学艺术都是根植于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的。地域文化就像肥沃的土地,用自己丰富的营养,滋养了文学艺术这棵常青之树。不论何种文学艺术,也不管何一时代的文学艺术,虽然它们的艺术风格、具体的艺术表现,以及所描述的内容等,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其内在里的文学艺术思维及其建构,却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印记。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又丰富着地域文化,使地域文化有了特定的艺术化的摹本与载体,并使其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文学文本,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容纳着地域文化的内容,甚至成为后代人研究前代社会风俗、生活风土人情的标本。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地域性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更易于叙写、更具有个性的叙事对象。简言之,我们认为,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既是相互容纳,又是相辅相成的。不过从概念内涵而言,文化的内涵自然要大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包含于文化的范畴之中。

具体来说,地域文化与文学叙事之间,有着如下密切的关系。

首先,地域性的地理环境生态风貌,构成了作家文学艺术叙事极为重要的内容。不论何种文体或者文学样式,恐怕难以完全将自然生态及其环境彻底根绝于文本叙事之外,相反,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天象地貌等等,成为文本的重要叙事对象和内容。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作品内容,最为通常的一种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描写。即作为社会生活展示演进与人物活动的一种自然空间。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作家还可以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化,来创造艺术的氛围,创造一种文学艺术的景象,创造出一种意境来。本质上应当是文学艺术叙事中,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交融建构。也就是说,作家在于自然生态及其环境艺术化的叙写中,通向人的自然的艺术的本质力量。

其次,地域文化为文学艺术叙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生活与智慧,乃至思想营养。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更离不开地域生活。因为地域

生活具有最为鲜活的生命活力。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俗话说十里乡俗不同。正是这不同的乡俗生活,才使得作家的创作,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化生活决定着作家文学叙事在生活内容上表现的特异个性。如果说某一时代的整体社会生活,为文学叙事奠定了一种生活基本基调,构成了作品生活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倾向,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原则,那么,地域文化生活则为文学叙事,提供了特异的生活内容,或者说是社会时代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它所体现的是特殊性的生活原则。如果说生活中蕴涵着人类的智慧,那么,地域文化生活中就蕴涵的是以其特异的方式加以表现的特殊智慧。某一地域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就是该地域民间生活思想智慧的艺术化表现和凝炼。民间生活中充满了人生的机智,洋溢着人生的智慧。民间生活中也蕴含着野性的生命活力。不仅如此,地域文化中也蕴涵着地域性极为明显的民间视角、民间立场。这些蕴涵于地域文化生活之中的态度、立场、价值判断等等,都为作家的文学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独特的生活智慧。

再次,不同的地域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艺术所特有的形态与传统。就是同一大文化区域,其文化艺术形式及其传统,也存在着差异性。比如西北地区,秦腔比较盛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秦腔是一种标志性文艺形式。但是,就是陕西,陕北、关中、陕南,秦腔在这三个地区人们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所重视的程度,以及对于秦腔的艺术理解与创构等,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更何况不同地域都有着自己标志性的文艺形式,像陕北的信天游、关中的民歌、陕南的花鼓戏等。某一地域盛行或者流行某种文化艺术形式,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历史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说那是因为某种文化艺术形式与地域文化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也就是这种艺术形式与

其所生存的地域文化生活之间,有着对应建构。换一种说法,某种文化艺术形式之中,熔铸着这一地域人们的生命情感,或者说这一地域人们的生命情感,就融汇于该地域的文化艺术形式建构之中。就此而言,这二者应当是一种同构关系。

最后,我们说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思维方式、艺术创造思维习惯,以及作家的创作行为方式,都有着潜在的制约作用。甚至可以说,地域文化所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不仅仅对于作家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形成终生的影响,而且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亦有着终生的影响,可以说这已构成他们艺术创造思维模态的基础乃至基本的思维方式。一个地域的文化创造,自然凝聚着该地域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凝练着该地域的艺术创造思维建构内质,也就必然表现出该地区艺术创造上的文化特性。地域文化对于作家有着先天性的生命基因的遗传性,但是这种遗传性的文化基因影响,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其影响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这一方面的地域文化基因影响重一些,有些人则哪一方面的地域文化基因影响大一些。甚至这种文化基因在人的生命发展运动中还会发生某种变化,形成其特有的文化生命结构。就空间性而言,同为某一地域文化环境中出生的人,一直固守于该地域,和后来离开本土进入到另外一种生存空间,其受本源地域文化的影响情形则是不相同的。一般而言,固守者要比离去者受本土文化影响浓重得多。

二、地域生活:乡土文学叙事的根基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今天来说,还谈论文学创作题材,或者说是创作对象的选择问题,似乎有些过时或者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是个不成问题的历史问题了。现实地看问题,目前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为宽松的时期,几乎没有创作禁区可言。但是,不论是从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抑或是就我们研究的对象而言,这一问题似乎都是无法避免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题材决定文学创作的情形。其根源在于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的文学创作思想。真理往往是向前多迈一步,便走向谬误。反映论文学创作思想,在笔者看来,就是在今天仍然有其合理性。就如同与其他文学创作思想一样,都不可能将文学创作的所有现象和情态一览无遗,任何创作思想,也都是从自己的理论视野对文学创作做出自己的阐释。如果将某一创作理论思想发展到绝对化,将其当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唯一理论思想,自然是要走向绝对化,在单一化创作思想指导下,使文学创作走向僵化。这种文学创作现状,直至1980年代中期方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作家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思想的转变,亦即文学创作思想的多元化异质共生建构状态的出现并得以发展。陕西这三位新时期文学创作上标志性作家,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当然,就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具体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历程来看,他们转化的情态又是有所不同的。

不仅这三位作家,陕西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部都是从乡土生活叙事起步的,并以创作乡村现实生活题材而著称于世。可以说乡土现实生活题材成就着陕西的当代文学创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着陕西的文学创作。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赢得第一束鲜花的,也是叙写各自故乡现实生活的创作。可以说,陕西这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深深根植于自己家乡的故土,他们的文学叙事,可以视为当代乡土叙事的典型文本。

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早期作品,无一不是取材于陕北现实生活。从他后来的创作谈,以及朋友的回忆显示,这些作品可以说都是发生在路遥身边的事情,或者说都是他陕北生活的记忆^[1-2]。就是《平

凡的世界》,虽然将社会时代背景以及地域空间,进行了拓展,用相当大的篇幅,对省城生活进行了叙写。但是,这部作品最为光彩夺目,最能显示路遥思想深度和艺术个性的,仍然是对于陕北黄土高原现实生活叙写的那部分内容。从路遥文学艺术世界的创构视角看,他是致力于城乡交叉地带现实生活与社会人生的开掘,但是,包括《平凡的世界》在内,仍算不上城市生活题材的创作,实为乡村乡土现实生活的艺术叙事。就此来说,路遥不仅是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阵地,而且是坚守陕北家乡故土现实生活叙事的。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关中平原,特别是他的故乡灞河塬就是他的文学基地,除了少量的散文游记外,他的主要文学创作样式小说,几乎全部取材于此。他的文学创作始于1960年代,但成名于70年代,或者说他真正走向文学创作道路是在70年代。为他赢得第一次掌声的《信任》,就取材于他所生活工作过的灞河塬。用他的话讲,他对农村不仅有着生活积累,而且有着更为深切生命情感体验。可以说一直到《白鹿原》创作的完成,他都坚守在灞河塬上。他把自己的来源于这片黄土地的全部社会生活积累和生命情感体验,又都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全部回赠给了这片热土地。《四妹子》、《康家大院》、《蓝袍先生》,还有被称为可以当枕头的当代新历史文化小说的扛鼎之作《白鹿原》,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从社会现实走向历史文化,但是,他笔下叙述的所有故事,则都发生在关中,凝注在灞河塬上。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陈忠实不仅在陕西,就从全国而言,都是地道的乡土作家,他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世界的白鹿原,已经成为一种乡土叙事的象征。研究当代中国的乡土叙事文学,人们就会自然而然想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创作上最有争议、最多争议的作家,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始终备受社会和文学界关注的作家。比较而言,贾平凹的创作题材似乎要比路遥、陈忠实更为宽泛一些。如果说路遥的文学基地在陕北,陈忠实的基地在关中平原主要是白鹿原上,那么,贾平凹的基地则有

两处——商州山地和古城西安。但就他文学创作的文化精神而言,我以为仍然是乡土叙事的。如果把贾平凹的创作以《废都》为坐标分界点的话,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从《满月儿》、《商州三录》到《浮躁》以及《五魁》等作品,可以说不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基本上都是取自商州山地生活。《废都》、《白夜》、《土门》、《高兴》等,不管人们对于这几部作品在文化精神上怎样看待,但有一点则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作品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所叙述的人和事,则是发生在城市这一生活背景之中。当然,贾平凹还有一些于生活空间上更为宽阔的创作,像《病相报告》。但是我们认为这类作品,艺术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则远远大于生活题材本身。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艺术创造的深厚程度与叙事建构境界圆润度上,我们认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乡土叙事要比城市叙事更能够反映出他的艺术个性。尤其是《秦腔》、《古炉》这两部作品,更是显现出贾平凹乡土叙事的深厚功底。这些作品,如果从文化精神向度看,贾平凹的精神归宿依然在商洛山地。

对于乡村生活的关注,路遥侧重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从社会生活层面展开叙事,把整个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纳入自己作品叙事视野,构建起一种宏阔的社会现实生活风貌。比如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非常明显的是把“文革”中整个社会生活面都展示了出来。《在困难的日子里》带有非常强烈的自传性叙事,但在路遥的笔下,个体的生活则完全融汇到了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为人们呈现的依然是“文革”社会生活的全貌状态。《人生》依然如此。高加林的个体生活与人生命运,亦是完全地消融在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之中。《平凡的世界》更是全景式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就此来说,路遥的确是非常虔诚地秉承了柳青的文学创作思想传统。或者说是以柳青文学创作思维模态为蓝本,适当地吸纳了一些苏俄文学与欧洲文学传统的艺术因质。在陕西这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路遥是长于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叙写的,最不长于社会政治

写作的是贾平凹。路遥对于现实生活的叙述,往往是从下到上,涉及各个级别层面人的生活。《人生》写到了乡县地三级的领导干部,《平凡的世界》写到了省级干部生活,但从叙事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和水准来看,越是高级别人物的生活,在叙写上个人化生活愈少,而社会化主要是政治化生活则占其主导地位,因而意识形态化痕迹越明显,类型化观念化的色彩也就越强。比较而言,越是下层人的生活,路遥叙写的更加真实感人。尤其是最为底层的乡村生活,写的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陈忠实是从现实生活走向了历史生活。其实,陈忠实是坚定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者。可以说,从1970年代后期直至80年代中期,陈忠实紧紧地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生活发展的脚步,非常忠实虔诚地关注着乡村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走向,用自己的笔将乡村生活的变化如实地记录下来。就此来说,陈忠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乡村生活的歌者。面对社会生活,直面现实人生,始终是陈忠实坚持的文学创作基本态度。他并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但是,这些社会现实矛盾则引起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与全国其他作家相比,他似乎总是要在对于社会生活的审视上慢一拍。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作家,将创作的目光专注于文化寻根的时候,他依然坚守着现实生活的反映上。这时,贾平凹虽然未主动加入当时文化寻根创作的行列,但是,他却从自己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等敏锐的感悟,创作出了在当时被视为跨越雷池的《“厦屋婆”悼文》等一系列文化反思的作品。这一方面,陈忠实与路遥有相似之处,都是坚守着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创作立场。陈忠实文学创作对象的变化,始于《蓝袍先生》创作所引发的思考。他在创作那批中篇小说过程中,“一个重大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

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本质触动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3]。也正是1986年陈忠实将创作对象的思考,开始从社会现实生活,走向了历史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生活。经过几年的思考准备,方才撕开了中国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生活,将叙事的触角,不仅伸向了历史生活,而且伸向了传统文化生活。《白鹿原》所叙述的不仅仅是中国从近代向现代再向当代转换的历史进程,更为重要也是《白鹿原》最具深度和特色的,就是对于以乡村村社生活方式为载体、以实践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样态入木三分展示。

贾平凹是游离于社会现实与民间历史情态之间。对于生活的开掘,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始终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首要选择。如果将贾平凹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加以统计,恐怕叙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不论是何种文学样式的创作,都占极重的分量。他获得国内外大奖的作品《满月儿》、《腊月·正月》、《浮躁》、《废都》、《秦腔》等,全属于现实生活题材范畴。在笔者看来,对于陕西作家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叙写,而在于叙写时生活层面的选择。正如前文所述,路遥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叙写,侧重于社会时代风云,着力表现的是社会整体生活。陈忠实更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家庭生活的记述,通过农家院落的生活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贾平凹亦是善于叙写家庭生活极其变化。对于乡村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关注,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或者说他们都更愿意从普通人的生活命运角度,来叙写社会现实生活。贾平凹对于现实生活的叙写,最为精彩也是最为吸引人的是生活琐事,富有生活情趣韵味的事情。他善于叙写普通人特别是乡下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往往是叙述“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4]。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上层人的生活是极少涉及的,《浮躁》中涉及到地区级干部生活,《病相报告》写了老干部生活,《废都》中对于市长生活的

叙写就更少了。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生活背景,并不能更好更充分展示贾平凹文学叙事的艺术特色和才智。

三、坚守中的超越:乡土叙事的个性创造

将当代社会现实生活,进行理想化的叙述,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创作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甚至成为一个潜规则。不论社会现实生活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矛盾重重,有多么的阴暗,多么的令人寒心甚至失望。但是作家则必须从中找到光明,展现光明,给人以希望。哪怕是这种希望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是令人不可信的。所以,当1950年代中期《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红豆》、《爬在旗杆上的人》、《改选》、《在悬崖上》等一批直面现实生活,大胆揭示出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存在问题与矛盾的作品出现时,便受到了批判否定。进入新时期,对于社会现实矛盾与问题的展示与解剖,已不再成为文学创作内容上的禁区。但是在如何处理上,似乎仍然存在着倾向性的问题。也许是历史的使然,即就是今天所出现的所谓的反腐败社会生活题材的创作,依然是要有希望光明的叙写,要给人以力量和期望。面包终究会有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不善于或者不宜于叙写绝望、颓废乃至堕落。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作家,是从学习和接受以赵树理、柳青等为标志的现当代红色乡土叙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换言之,它们是从学习乡村叙事进而发展到乡土叙事的。这也是当代中国乡土叙事文学发展演变的普遍现象。当然,他们自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初期,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叙述,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或者说写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亮色,是他们初始创作上的一个基本思想特点。这种叙事可以称之为理想化、革命化的乡土生活叙事。比较而言,路遥似乎一开始便将创作的关注焦点,定位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现实生活的叙事上。

路遥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对于严峻而重大

社会人生生活的叙述,其间涌动着一种抗争奋进的生活力量,尤其是于逆境中挣脱困顿的精神力量,给那些正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奋进的人们以心灵上的对应,使他们得以心灵上的慰藉。也许正因为如此叙事,赢得了更多的普通人的青睐。“城乡交叉地带”构成了路遥乡土生活叙事的基本视域。这一方面的论述很多,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也就是说,路遥的乡土叙事模态建构,从生活对象角度来看,就是他所叙述的是陕北乃至关中地域从乡村到城市过渡地带的社会现实生活。换句话说,“城乡交叉地带”便构成了他乡土叙事模态的基本生活内涵建构的框架。因为在这个交叉地带,“种种的矛盾,纵横交错,就像一个多棱角的立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面,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5]。很显然,路遥在1980年代初说这样的话时,虽然明确确定了自己进行乡土生活叙事的视域,但是,他主要还是从社会化生活叙事视野看待问题的,而对于地域性和乡土性的生活,他还未形成自己成熟而自觉的观念。在《平凡的世界》创作,特别是总结这部作品创作历程和经验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可以说路遥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创作思想,对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坚守与阐发,得到更为完善的体现。

陈忠实的乡土文学叙事,依然倾注着一种生活的力量,于直面现实中,蕴含着刚毅沉稳的人格精神。《白鹿原》中的对于白嘉轩生活命运的叙述,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陈忠实乡土生活叙事的基本特征。在这里陈忠实已经从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想化叙事,走向了生命精神与文化人格建构叙事,现实生活层面的叙事,仅仅是生命精神与文化人格叙事建构的一种具象化的言说展现而已。所以,陈忠实的乡土文学叙事,已经完全走出了现实生活理想化叙事模态,建构起他自己的历史文化人格叙事模态。陈忠实的成功在于,从社会模态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历史文化模态的现实主义。陈忠实的这部作品,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实践儒家文化的把握和认识的准确与深度,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陈忠实有一个艰苦

的文学创作嬗变的过程,他从社会现实视野转向历史文化视野,这之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蓝袍先生》以及《康家小院》等,就是他这个过渡时期的作品。《白鹿原》是他探索的结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终结。《白鹿原》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写到了极致,将中国乡村儒家文化浸透的文化实践人格写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及其人格建构和近现代社会的一个标本。仅就此而言,不论对于陈忠实,还是对于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白鹿原》都是个奇峰,也是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一个高度。

对于贾平凹的乡土文学叙事,不论是评论界或者普通的读者之中,常常听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些人更喜爱他初期即《满月儿》、《月迹》等作品,这些作品中透析着一种清新优美、情景空灵的乡土生活韵味。而不喜欢《废都》及其之后的创作,主要是认为基调不够清新优美,其间蕴含更多的浑浊茫然的生活意蕴。或者说,他后来建构的是一种浑沌茫然的乡土叙事。也有些人则认为《满月儿》虽然清莹剔透,但不够浑厚。《废都》之后,其创作更为深厚苍茫。从贾平凹创作的发展历程来看,他于《“厦屋婆”悼文》起,便致力摆脱理想化的乡土生活叙事,而走向揭示与剖析现实生活的乡土叙事。出现于贾平

凹笔下的乡土社会生活与现实人生都是残缺的。《五魁》等一组作品,建构的就是一种残缺之美的生活叙事。此后,在贾平凹文学创作叙事上,几乎没有完美的生活建构。这一方面源自作家自身的生命情感裂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现实生活本身所致。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浮躁》、《废都》、《秦腔》、《古炉》,这几部作品是他标志性的长篇小说。他走的是不仅在陕西,就是全国都是一条特异的文学创作路子。对于当代文学传统,他的创新性大于继承性。他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他试图改变中国现代文学以来所形成的汉语写作思维方式和艺术建构模态,要建立新汉语写作,这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一个命题。他试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创当代文学创作新汉语写作的先河。由此可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既是根植于乡土,建构着新的乡土文学叙事,同时,也在超越着乡土叙事,从而走到了更为宽阔的文学叙事境地。但是,他的这种探索,使他获得的声誉与他得到的毁誉几乎对等。他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文坛的焦点上,不论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一直关注着他,褒也罢,贬也好,他身上好像有一股子魔气,总吸引着人的注意力。这是应当引起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41,52.
- [2]申晓.守望路遥[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16,76.
- [3]陈忠实.陈忠实创作申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11.
- [4]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18.
- [4]马一夫,厚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8.